

[书评]

公私模糊的皇权底色与制度蛀空的循环宿命：跟随张鸣窥探帝制中国的官场逻辑与国民惯性

评张鸣：《再谈国民性：从近代史看中国国民性》

JokingKong · 2026-07-24 12:37

「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

世人总爱从故纸堆里找寻某种现世的安稳，或者为当下的荒谬开脱，那些隔了百年的宫廷轶事、官场潜规则，常在某个不经意的深夜，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迎头相撞。这种奇妙的互文教人疑惑，历史究竟是已经过去的陈迹，还是一头披着现代外衣、在原地不断打转的巨兽。

在那些茶余饭后的喧嚣中，宏大的军政叙事被悄然解构，人们不再热衷于数点坚船利炮的吨位，转而迷恋起朱红城墙内的呼吸与叹息。这大抵便是近代史通俗解读在近十余年间悄然兴起的心理解剖，大众开始明白，真正左右一个庞大帝国转向的，往往不是宣战诏书上的大印，而是深埋于朝野上下、千万庶民骨血之中的文化惯性与心理弱点。正是在这样一种阅读审美的流变中，一本不立宏论、偏爱在历史废墟里捡拾瓦砾的随笔集被递到了读者面前，这便是张鸣的《再谈国民性》。

翻开这本略显松弛的书，首先撞进眼帘的是那些被朱笔勾勒得过于清晰的皇家底色。古人常说“家国天下”，在漫长的帝制黄昏里，这两者从未真正剥离开来。上层的皇权，庞大而又幽深，它既是维系千万里疆域的终极支柱，也是一切寄生虫繁衍的无上温床。我们在传统的宏大叙事里读到了太多关于权力交接的血雨腥风，却极少有人去戳破那层温情脉脉的礼法面纱。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先秦的封建体制本质上是一场分封私产的家族政治，天子与诸侯、大夫之间，维系的是血缘与家臣的依附。到了郡县制大行其道的时代，天下的性质变了，它成了皇帝一人的绝对私产，官员们的身份也从世袭的家臣，沦为了可以随时被任免、赏赐乃至剥夺性命的帝国雇员。

然而，这并非是一场彻底的雇佣契约，帝国的治理太过庞杂，绝非一人之智所能独断，于是皇权在无上的孤独中，不得不向官僚体系让渡一部分生存空间。张鸣说：

「事实上，帝制时代的官员，不可能仅仅是皇帝的家臣，而且带有某种公共性质，管理地方，不仅要顾及皇帝，还要考虑地方的利益。皇帝也是一样，皇帝的天下，一半是自己家的私产，一半是公共性的公司。这个公司，要靠官员一起来维持。」

这种公私边界的模糊与拉锯，成为了贯穿几千年历史的隐秘轴心。每当皇帝想要乾纲独断，将庞大的国事化解为自己的私人旨意时，“天子家事”便成了最好的挡箭牌；而当朝臣们试图拉住疯狂奔驰的皇权缰绳时，他们又会把皇家的废立立储，无限升格为关乎社稷存亡的天下大计。唐高宗立武后时的李勣、唐玄宗废储时的李林甫，乃至大礼仪中在左顺门哭天抢地的明朝群臣，都在这套公私不分的泥潭里闪展腾挪。权力在此处展现出一种奇特的弹性，它黏稠、沉重、充满世俗的算计，唯独缺乏现代政治急需的清晰与边界。

在公私深度绑定的权力生态下，帝王个人的性格往往直接绑架了整个王朝的运势。这是一种极具戏剧性却又让人感到悲凉的政治现实。以唐玄宗李隆基为例，这位在梨园行里被奉为祖师爷的才子皇帝，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豪赌之徒。早年间在马球场上，他能以四人对阵吐蕃十人，在风驰电掣的马蹄声中孤注一掷；在唐隆政变那夜，他更是只率数十亲信突袭皇宫，以百人敌数千卫士，将全族性命压在政治的天平上。敢弄险、爱极致的性格，让他开创了繁花似锦的开元盛世，却也让他放任安禄山做大，最终酿成了几乎流干帝国鲜血的安史之乱。王朝的极盛与极衰，往往就在帝王一念之间的豪赌中完成了交割。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权力在清代呈现出一种更为琐碎、也更为虚伪的面相。道光帝把打着补丁的朝服穿成了道德标杆，咸丰帝为了修补一条杭纱套裤不惜耗费巨资，这种看似克勤克俭的表演，背后是整个内务府尾大不掉的利益分赃。皇帝想省钱，围绕着他寄生的庞大机构首先不答应，于是节俭变成了最昂贵的作秀，变成了面向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绑架。同样，雍正对待钱名世的诛心之术，不杀其肉体，却强令全体朝臣写诗痛骂，编纂《御制钱名世》诗集广为传诵，这种文雅的精神凌迟，比菜市口的斩首更能摧毁士人的脊梁。皇权的面子，在光绪年间那场午门护军与太监的冲突中更是暴露无遗，制度的对错在慈禧太后的威严面前退居幕后，最终只能靠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来维持宫廷的虚妄平衡。

直到庚子国变，这位平日里吃着数百道御膳的太后，在逃难路上啃着玉米秸、喝着稀粥，在颠沛流离中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这种切肤之痛，才被迫成为了后来推行新政的催化剂。帝制的终结并非隆裕太后的主动大度，而是在无钱无兵的绝境下，一场关于优待条件的务实谈判，它留下一段平和的尾巴，却未能洗净根植于民间的权力崇拜。

当目光从权力的顶端下沉，落到那群在大一统机器里扮演螺丝钉的官僚阶层时，我们会发现另一

场更加精致、也更加荒诞的官场戏梦。在这个依附于皇权的庞大网络里，生存的最高法则不是办事的效果，而是身份的攀附与权力的表演。中国人骨子里对祖先的狂热，往往在发迹后异化为一种极具功利色彩的族谱伪造。杜月笙成名后要请章太炎考证祖先，袁世凯为了称帝不惜认明代抗清名将袁崇焕为先祖，这种“找阔祖宗”的把戏在民间与官场屡见不鲜。真实的家族脉络在耀眼的权力光环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人们急切地需要古圣先贤来为当下的僭越背书。这种对权威的谄媚，在袁世凯称帝时的“劝进”大戏中达到了高潮。各省代表拿着丰厚的路费进京，在筹安会的导演下，心照不宣地三呼万岁。戏台上的主角自我陶醉，台下的观众与配角各怀心思，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那万岁的神话，但所有人都在高度配合这场权力的仪式。张鸣说：

「有皇帝，就有祥瑞。如果赶上皇帝不自信，又急于证明点什么，祥瑞就更多。据说有了祥瑞，就证明当下是盛世，既然是盛世，君主也就是明君了。」

这是一场庞大的集体共谋，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个体制里，个人的命运从来不在于才干的显晦，而在于你是否准确地站进了权力的队列之中。张鸣总结得通俗、好懂且精准：

「王朝政治，讲究跟对人，但跟对人很难，很有技巧。跟对了人，即使才具平平，也一样无灾无害到公卿；跟不对人，即使一身的本事，照样一辈子沉沦下僚。跟人，关键在于怎么跟上。不送礼不行，傻傻地送更不行，送礼谁都会，但不是说礼送到了，官就做好了。这里面的学问，从来都比当官做事要大。」

在这种把跟人当成第一学问的生态里，贪腐与潜规则自然而然地从阴暗的角落走到了阳光下，成为了一种公开的、甚至是带有制度性必然的生存方式。晚清奕劻的贪腐人尽皆知，王府门前一边贴着禁止收门包的堂皇告示，门丁一边照常勒索着进门费。朝廷明知其弊，慈禧却依旧重用，因为在最高统治者眼中，清廉永远是次要的德行，对皇权的绝对效忠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更何况，低俸制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斩断了清廉的可能，七品知县那点微薄的年俸，连雇佣幕友、维持生计都不够，于是地方官靠横征暴敛、寻租变现，京官靠地方的“冰敬”、“炭敬”维持体面，连学政强制秀才购买自己的著作都成了一种雅致的盘剥。在权力的重压下，所谓的政治道德往往变成了一块随时可以丢弃的抹布。张鸣在谈到古代官僚的底线时，曾有一段一针见血的论述：

「一个王朝在盛期的时候，皇帝是绝对不喜欢臣子们结成朋党的，更不喜欢某个权臣拥有一大堆党羽。但是，这样的事从来都免不了。中国人但凡出了家乡，没有朋党，就没法子活了。如果说，在王朝的盛期，皇帝的禁令还有人理会，那么到了王朝的末期，人人都在找出路，朝廷里“党”或者说集团，就愈发兴盛了。」

当整个体制内的人都必须依靠制度的漏洞才能饱腹时，任何试图强化监管的尝试都注定会演变成一场更加畸形的猫鼠游戏。清代户部银库的防范不可谓不严，库兵进出必须脱光衣服、跨板凳、拍手掌喊号，甚至要高声呼喊以防口中含银。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库兵们最终训练出用肛门夹带银两的绝活，并在胥吏、库兵与主管官员之间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分赃链条。张鸣如此说道

：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还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更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再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何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究其原因，张鸣补充道：

「因为在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以及跟在胥吏和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实行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官员生活得半死不活，胥吏及以下当差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

这种对制度的合力蚕食，导致了官僚体系无可挽回的臃肿与失效。像太常寺、詹事府这类毫无实职的闲散衙门，在漫长的历史中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它们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是为了给庞大的读书人队伍提供升迁的台阶和安身立命的爵禄。古代的读书人一边满口仁义道德，一边在权力的诱惑面前丑态百出。张鸣说：

「自打有了阉人，尤其是有了宦官专权这回事以来，士大夫对于这些缺少男人关键零件的人一向充满了鄙夷。别人干坏事也就罢了，没了那话儿的阉人也干，尤其是凭借皇帝的信任，干得一样热火朝天，真让人受不了。所以，历朝历代，虽然宦官经常得势，但作为士大夫公然拍宦官的马屁，多少还是有心理障碍，别的不说，自己圈里的说长道短就让人受不了。说起来，明代是个特别讲究气节的朝代，程朱理学已经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偏是这个朝代，士大夫之无耻也创了纪录。」

戊戌变法时裁撤几个闲衙门引发的冲天怨气，以及慈禧政变后恢复旧制带来的官心大悦，无不昭示着这个老大帝国在面对现代转型时那沉重的惰性。而这种惰性一旦蔓延到军队，便是一场灾难。晚唐五代的牙兵牙将，作为将领的私兵，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忠诚，唯一的维系纽带便是赏赐的加码，这种欲壑难填的武人逻辑，让王朝的更迭如同儿戏，平均寿命不过十余年。

到了明清时期，军队的腐化则走向了吃空额、喝兵血的琐碎平庸，平时的绿营兵克扣军饷、雇人应付点验，战时的军队劫掠百姓、视民如草芥，以至于民间对正规军的恐惧远甚于土匪。袁世凯的新军虽然通过亲自发饷、寄银回家的现代管理手段解决了克扣问题，却在客观上将国家军队变成了私人武装，士兵只知袁首领不知大清朝，为后来的军阀割据、遍地混战埋下了致命的伏笔。更让人感到绝望的是基层权力的失控，班房作为衙役休息的法外之地，成为了随意拘禁平民、敲

诈勒索的法外黑洞，无数涉讼、欠租的百姓在无需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被折磨致死。这种上有皇家公私不分的独断、下有官场寻租表演的惯性，相互嵌套、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帝制中国最为稳供、也最难自我涤荡的政治底色。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官僚体系的黑暗网络中移开，转而投向那些在变局中挣扎的精英阶层，会看到一副更加复杂、也更加富有隐喻色彩的众生相。在《精英的小辫子》这一脉络里，脑后的那根辫子，不再仅仅是满洲统治者的政治符号，而是异化为了精英们在现代文明冲击下最后的精神遮羞布。满人亲贵内部的分化，本身就是一场历史的黑色幽默。肃亲王善耆，这位出身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为官清廉、杜绝崇文门税务的潜规则，在晚清的腐败大潮中算得上一股清流。

然而，在慈禧太后那套纯熟的权力平衡术里，开明干练的善耆始终无法得到真正重用，反倒是贪鄙成性的奕劻稳坐高位。因为在风雨飘摇的宫廷里，主子用人，忠诚度永远高过能力，奕劻的贪腐是握在太后手里的把柄，抓得住、放得心，而善耆的清望反而成了被猜忌的理由。大清灭亡后，这位当年的贤王最终困在了复辟的执念中，不惜勾结日本势力，甚至放任女儿川岛芳子走上万劫不复之路，一生的清名悉数葬送于对家天下的眷恋。而像端王载漪那样昏聩的权贵，为了将儿子推上帝位，竟然可以盲目地利用义和团排外，将私怨升级为国难，把整个帝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贤愚迥异的命运，最终都无法逃脱旧体制对人性的扭曲与束缚。

汉臣们在官场上的表现，同样充满了旧文化的惯性与挣扎。左宗棠作为一个靠军功起家的“非典型官僚”，从未在正规的科举官场里摸爬滚打，以至于七十岁进入军机处时，对宫廷礼数一窍不通，议事时动辄自比诸葛、大谈新疆战功，与那些长袖善舞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恃才傲物，本质上是对官僚规则的一种天然不适。与之相对的，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那套炉火纯青的“挺经”。曾国藩靠一个“挺”字硬扛着太平军的惊涛骇浪，却在天津教案后被舆论批得体无完肤，一世英名几乎毁于一旦；李鸿章则展现出更强的韧性，甲午战败后虽被剥去实权，仍赖在北京的贤良寺不肯退隐，在冷遇中静静等待复出的时机。

这种在灰色生态里游刃有余的生存智慧，到了直隶总督杨士骧那里，则变成了一种近乎无耻的索贿艺术。杨士骧习惯在当众痛骂下属的过程中索取好处，“小骂得财物，大骂得金银”，下属们被骂得越狠，送礼送得越勤，双方心照不宣，将腐败演变成了一场优雅的官场默契。而那场震惊朝野的刺马案，其官方结论虽然是私怨仇杀，民间却执着地将其演绎成总督霸占义兄弟之妻的桃色阴谋。在长期处于黑箱政治的社会里，民众天然地不信任任何来自官方的平淡结论，他们更愿意用离奇、阴谋与戏剧性的猜想，来填补对权力运作的认知鸿沟。

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则成为了这种转型期的畸形产物，他一方面是才华横溢、精通昆曲的风流名士，另一方面却在上海加入青帮，成为了辈分极高的大字辈大佬。这种灰色势力

的抬头，正是权力失序后的畸形产物。正如张鸣所言：

「事实上，所有的黑社会都跟专制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极权政府，才会对黑社会下手，而专制体制，本身就是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当强人政权崩塌、旧精英失去体面的寄生土壤时，依附于帮会便成了他们维持生计与虚荣的唯一出路。而篇末那些留着辫子守节的王国维、辜鸿铭，与早早剪掉辫子的溥仪、载沣形成了极其讽刺的对比，梁鼎芬在崇陵守陵博取名声、却不忘拍照流传的举动，更让这种“守节”带上了浓厚的名节表演成分。辫子早已不再是忠诚的象征，而成了他们面对现代文明巨浪时，试图紧紧抓在手里的最后一根稻草。

将分析的视角从精英阶层进一步下沉，落到民间的传统习俗与普遍心理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被供奉在庙堂之上的宏大宏论，在底层的现实生存面前，往往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分裂与错位。官方将孔子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修建起规模宏大的孔庙，但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信仰里，那里的香火远不如送子观音、文昌帝君或者魁星来得旺盛。因为后者能够直接解决求功名、求子嗣的现实焦虑，儒家的崇高道德在务实的民间信仰面前，不得被改造成符合功利需求的实用工具。同样，礼教在书本上大肆宣扬女子的贞操，视失贞为比死亡更可怕的耻辱，但在底层的真实生活里，由于高昂的娶妻成本，许多贫苦百姓对妻子的出轨往往采取容忍与妥协的态度。经济的精打细算在绝大多数时候都轻易击碎了道德的教条，官方精心构建的伦理秩序，从未真正完美地落地为民间全员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道德上的高调与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构成了国民性格里极其顽固的双重标准。

而在近代中西碰撞的暴风雨中，如此一种思维的顽固惯性则演变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极端与偏执。晚清保守派的代表倭仁，面对西学的步步紧逼，高喊着“忠信为干戈舟楫”的空洞口号，在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后，竟然气得中风病逝。这种旧式士大夫在变局前的无力与偏执，是文化保守势力强大惯性的一个缩影。同文馆作为第一所官办的新式学堂，由于科举精英的集体抵制和鄙视，最终落得名存实亡的下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医传入的历程，最初被无知的民众视为挖眼剖心的邪术，处处遭到排斥与围攻；而到了民国时期政府极力西化时，又有一群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彻底废止中医。

从全盘的否定到全盘的肯定，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文明时，似乎始终无法建立起一种平和、理性的对等心态，总是陷在非黑即白的极端逻辑里无法自拔。在教案的处理中，这种心态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官府在暗中挑唆煽动民众的排外情绪，一旦激起列强的武力报复，又立刻变脸、屈从于割地赔款，民众盲目地盲动，官府推卸责任，列强武力施压，三者共同构成了近代中西冲突中永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类似的改革话语不断走样与失效，最终将满清王朝推向了不可挽回的终结。回顾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历史流变，顽固派的声音虽然从最初的高亢逐渐走向了甲午之后的失语，但朝廷在真正面临改革良机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极其短视的权力占有欲。清末新政本是最后一次挽救危局的机会，然而满人亲贵却在关键时刻逆势收权，推出了一个几乎全由皇族组成的“皇族内阁”，这一举动将原本倾向于改良的地方实力派与立宪派彻底推向了対立面。当朝廷失去了对改革话语权的主导，革命的暴风雨便成为了唯一的选项。

在这样一种长期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会发现，体制的僵化、精英的表演与民间的保守，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千年来家天下的权力结构与儒法互补的文化驯化，培养出了一枚权力至上、重形式轻实效、习惯于趋利妥协的国民底色。每一次试图向现代文明靠拢的改革，都在这套强大的惯性中最终走样变形，要么沦为应付差事的表面文章，要么走向了原本意图的反面。正如作者在全书最深沉处的考察中所展现的那样，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秩序时的屡屡失语，并非仅仅是军事力量的悬殊，而是整个古老文明在面对现代规则时，表现出的一种深刻的心理与行为的适配困境。

然而，当我们合上这本《再谈国民性》，从那些充满黑色幽默的历史碎片中抽身出来，重新审视这本书本身的文本质感时，心中却难免生出一些复杂的况味。作为一本由多篇短小精炼的历史随笔汇编而成的随笔集，它延续了作者一贯松弛随性、不设宏大理论框架的杂文笔法。它不急于搭建一个无懈可击的社会学模型，而是满足于用大量的宫廷轶事、官场潜规则、精英众生相和民间风俗的碎片，来拼凑出一幅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心理的侧写。这种从小事件解剖大制度的路径，虽然保留了作者独特的读史视角与文字趣味，但对比他另外两本分量极重的代表作《共和中的帝制》与《历史的坏脾气》，本书的整体阅读质感显然稍逊一筹。

不少读者在评价其文字时，常会提及一种带有地摊文学的通俗感，而在《再谈国民性》中，这种倾向确实表现得更为突出。书名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关于国民性理论专著的沉重期待，然而实际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篇篇依靠小故事传递观点的历史短评。这种期待与文本形式之间的匹配度不高，算得上是本书一处显而易见的缺憾。它刻意追求了通俗化的表达，却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深挖与文笔的精细打磨。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写作者，始终守住了自己的写作底线。他并不会像那些真正的地摊文学一样，不分虚实地胡乱堆砌野史、杜撰离奇的情节。行文中若是引入了坊间的野闻轶事，他都会主动在段落中进行标准与区分，明确告知读者何为正史记载、何为传闻演义。虽然杂文的体裁为了叙事的流畅和丰富文章的层次，没有附加规范的学术注释，但他提前说明的态度，有效地避免了对普通读者的误导。

这种依靠小故事传递观点的杂谈体裁，其利弊是非常鲜明的。对于那些习惯了学术专著晦涩框架

的读者而言，这样一本抛弃了纯粹说理、叙事远多于长篇大论的历史随笔，无疑是一本极佳的休闲历史读物。它用一种极其接人气的笔调，把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历史大势，消解成了帝王将相们的行为逻辑与人情世故。在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官场现形记里，读者能够极其轻松地捕捉到传统体制塑造下的国民特质，并将其作为一面反思当下社会人情与思维惯性的镜子。然而，若是读者抱着系统研读国民性相关理论、寻求宏大制度解药的目的而来，此书显然并不适合作为首选。

在这个意义上，《再谈国民性》更像是一场在历史茶馆里的闲聊。说书人坐在柜台后面，不紧不慢地抓起一把历史的瓜子壳，一边指着那些远去的清国留学生的假辫子，一边对现代生活里的官话套话发出几声顽皮的冷笑。它没有手术刀般的凌厉，却有着一种在黑箱旁生活久了之后的干练与通透。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个段落里去寻找那些被过度修饰的冷峻，因为历史本身的荒谬已经足够让人叹息。

读懂近代国民性，说到底是为了看清我们自己至今仍未走出的精神围墙。当那些百年前的权力表演、双重标准与重形式轻实效的风气，依然在现代社会的某个角落里隐秘地回响时，这本略显通俗的随笔集，便在它松弛的文字背后，向每一个行色匆匆的现代人，投去了一道充满警醒意义的、真诚而又无奈的注视。



扫码进原文:

<https://ximutan.com/forum/post/39>

以书会友，谈论天下

© 西木读书论坛